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知識份子·傳媒與國家行為

### 美國的芒刺與良心 ——論喬姆斯基和他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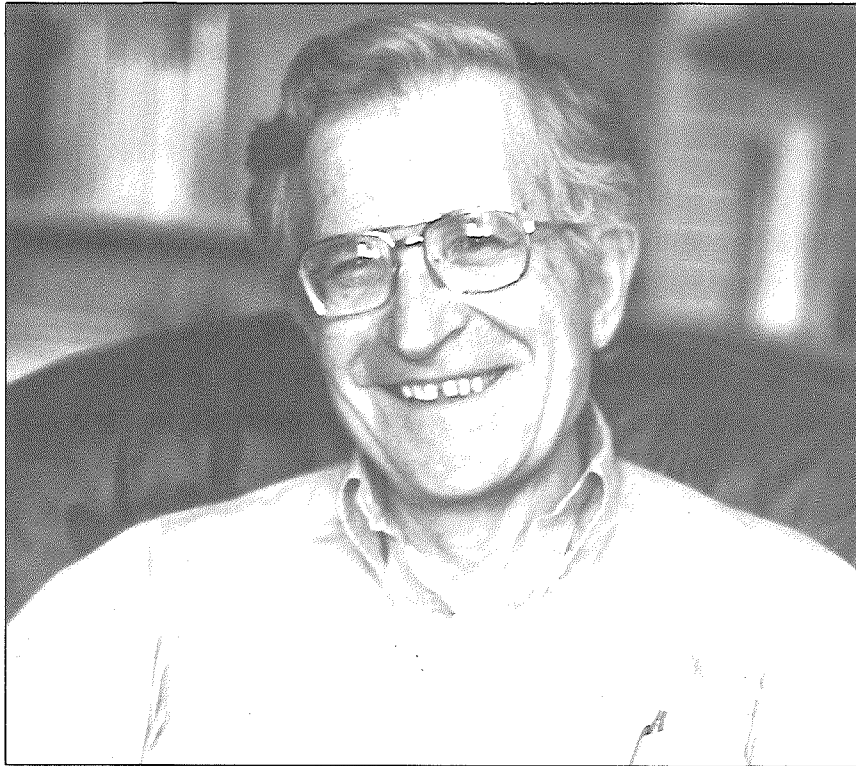
陳方正

人類文明的一個基本悖論是：它一方面宣揚理想，建立秩序，另一方面卻又必然在外部世界踐踏這個理想，破壞這個秩序。而且，還要令在它意識形態控制下的內部民眾接受這個矛盾，忘記這個矛盾，甚至把這個矛盾所引起的衝突、屠殺視為伸張正義所必須採取的行動。在古羅馬帝國、漢唐帝國、大英帝國，以至今日的美國，都是如此，都沒有例外。事實上，以思想、言論來誘惑、操縱和整合社會的力量，正就是文明的本質——不，應該說，文明社會的特徵，就是能夠調節自我意識，令觀念中的理想與實際上的利益結合無間。

然而，這種調節自我意識的能力雖然龐大，卻也並非無限。偶然，也還會有文明殿堂中那麼奇特的一、兩個先知，對理想本身認真起來，不再願意宣誦聖典中的儀文，而執意要回到曠野，發出內心的呼喊，那就不免產生尷尬和混亂。十六世紀的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和今日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都是這樣的先知和鬥士。

當西班牙人開始征服墨西哥的時候，隨軍教士卡薩斯目睹印第安土人被屠殺滅種的慘況，良心大受責備，因而發憤著書，記載這段慘絕人寰的痛史，後來更回國奔走活動，呼籲廢除武力傳教，停止不人道的奴役和掠奪——也就是放棄整個美洲殖民帝國。他這些不識時務的大膽言論雖然沒有招來殺身之禍（也許是憫於其誠，宗教審判法庭放過了他），但也沒有引起迴響。他曠野中的呼喊，只換來沉默和忽視，直到四百年後，才被歷史學家重新發掘出來，加以重視。

到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西歐殘破衰落了，美國則毛羽豐滿，開始用另一種方式，另一種姿態，向整個世界擴張，建立它的商業和軍事同盟帝國。但



喬姆斯基近照

是，方式儘管改變，手段儘管圓滑、間接和隱蔽，策略和目標卻仍然相同：即憑藉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優勢所產生的權力，來控制更多土地、資源、人口，攫取更多財富，而且，必要時不惜訴諸赤裸裸的武力，來保衛成果，或者攻取戰略目標。半個世紀以來，在它的後院拉丁美洲是這樣（那從門羅主義的宣布算起其實已經有一個半世紀歷史），在東亞是這樣，在中東也是這樣。越南戰爭只不過是暴露了美國霸權擴張最酷烈、最不能掩飾的一面而已。

而喬姆斯基，麻省理工學院的頂級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當代語言學大師，美國建制精英中的精英，正就是通過越南戰火的思想洗禮，而堅定信念，而成為「粗暴、殘忍、偽善」的美國國家權力最憤怒、最有力和最執着的揭露者和控訴者的。

作為一個出生於20年代的猶太家庭寵兒，早年的喬姆斯基受到三種迥然不同思潮的強力沖刷，其一是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其二是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其三是美國精英文化。這三者都在他的思想留下痕跡，但各自又都不能滿足他對理想社會的追尋。其實，對青年喬姆斯基來說，上述三種思潮是相通而不是相矛盾的。他雖然自幼就讀先進的實驗學校，其後在精英教育系統中一帆風順，26歲當上名校教授，30來歲就成為新語言學創始人，然而，在舒適的學術殿堂中，他並沒有放棄童年時代曾令他如痴如醉的社會主義思潮，反因越戰的刺激而展開對整個美國社會、文化與霸權的嚴厲抨擊，歷三十年而一無反悔，終於走出一條既獨特亦復奇特的雙軌道路。至於他少年時代建立一個博愛的、社會主義式的阿拉伯—猶太聯合社區（而不是狹隘猶太民族國家）的夢

想則至終破碎了。從此美國—以色列的侵略性聯盟亦同樣成為他的攻擊對象。因此，他對理性、平等、自由的追求是始終一貫，完全不因個人背景和地位而有任何偏頗的。

喬姆斯基在語言學上著作等身，政治評論文章、書籍、訪談、電視紀錄片更是汗牛充棟。但他的政治思想並不深奧複雜，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三點：第一，美國基本上是由壟斷性企業集團控制的社會，50年代以來美國的對外戰爭和外交干涉表面上是為人權、正義、和平，實際上則是為了擴張勢力，扶植可以操縱的友好乃至傀儡政權，而且手段從賄賂、中傷、暗算到武力干涉無所不用其極。第二，美國的知識份子和傳媒表面上監督政府、抨擊政府，實際上是沆瀣一氣，為政府和商界立下辯論基調，限制不同意見的發揮，製造多元和反對聲音的假象。第三，政府、商界、傳媒之間的默契與配合並不是偶然，而是通過長期、有系統的無形自我選擇機制所形成，是任何個人都無從忽視或抗拒的，只有廣泛喚起民眾的覺醒之後，才有根本改變的希望。

對他的大聲疾呼，對他這些冒大不韙、驚世駭俗的言論，美國政府、學界和傳媒的反應和西班牙對卡薩斯的反應差不多：普遍的沉默與漠視。長期以來，他要出書、要上電視，都只有靠加拿大文化機構的支持。現在，經過三十年鏗而不捨的奮鬥，他的名氣再也不可能在美國掩蓋了，卻又面臨另一種更可怕的危機：成為家曉戶喻的海報人物，其憤怒、不妥協的思想被化約成無害的格言，在大學新生討論班和雞尾酒會上作為時髦話題被拋來拋去。這是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強韌之處，也是它能夠抵受像喬姆斯基這麼兇猛堅定的衝擊的理由。

喬姆斯基是一位令人欽佩的鬥士，他的分析和控訴是深入的，強有力的。但他的社會分析和政治理想，即美國是一個完全由資本家所操縱的不平等社會，而它富於侵略性的種種國家行為可以通過喚起民眾的正義感和政治參與而基本改變，卻恐怕是過分簡單化和道德化了。事實上，這行為正就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深層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多也不少。否則它怎麼會產生那麼璀璨的成果，而又獲得那樣廣泛的公眾默認和支持？單純以少數人有意識、有計劃的陰謀來解釋這樣一個歷時數十百年的穩定現象，固然有其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和衝擊力，但對其背後的文化和文明之改造，卻似乎缺乏正面建構意義。當然，先知的功能是控訴、是指斥，是推翻聖殿中的攤檔，而不是分析和建造。而活在二十世紀的喬姆斯基恰恰是一位舊約先知(prophet)型的人物。

歸根究柢，怎樣消除一個文明內部的，以及內部和外部的大差別，而同時維持其活力，也就是說，如何建構文明之間的文明，那才是問題根源所在。而這一個問題，是百餘年來孜孜追求富強，而又經歷了多次重大道德性危機的中國所再也不能迴避的了。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